

日本经济多重承压破解乏力

吴怀中 李清如

世经述评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剧的复杂环境下，日本经济受到多重负面因素明显冲击，承压趋重。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2022年一季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跌入负值，换算年率为-1.0%。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复苏速度迟缓，消费低迷，贸易收支持续逆差，尚未进入稳定增长轨道；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供应链受零部件短缺、物流阻碍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日元快速贬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给日本企业和居民造成较大压力。这些短期经济困难正是长期结构性问题在特定危机环境影响下的集中爆发和突出体现。

在此背景下，日本更需构建并维护良好的全球经济秩序与环境，尤其要推进后疫情时代健康良性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合作，摒弃人为“筑墙”“脱钩”“拉圈”之举，积极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本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宏观经济复苏迟缓

尽管出现一些复苏迹象，但日本经济恢复乏力。2022年6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2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预期下调为1.7%，较1月份的预测下降1.2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6%），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9%）。根据内阁府的统计，从2021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的五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换算年率分别为-1.3%、2.1%、-2.9%、3.8%、-1.0%，呈现正负交替的状态，难以维持两个季度以上的连续正增长，说明日本经济还没有进入稳定的复苏轨道。一直到2022年一季度，日本实际GDP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即2019年四季度的水平，而美国和欧元区已在2021年二、三季度达到疫情前水平。日本经济复苏速度明显迟缓，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使日本未来经济走势更加不明朗。

从内需来看，今年以来，受新一轮疫情感染者人数急升及俄乌冲突等影响，日本个人消费低迷，特别是旅游、交通、餐饮、住宿和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严重打击，季度环比增长率降为零；企业设备投资虽有一定增长，但增长率也仅为0.5%，不足以将整体经济带出负增长状态。

从外需来看，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截至2022年4月份，日本对外商品贸易收支连续9个月逆差，这主要是由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进口商品贸易额所致。2022年1月份至4月份，出口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4.0%，而进口增长率则高达33.2%，月均贸易逆差额为1.04万亿日元。按日本财政年度（2021年4月份至2022

年3月份）计算的全年度逆差额达到5.4万亿日元，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4月份，原油的进口同比增长率达到99.3%，煤炭的进口同比增长率达到198.9%。

生产生活面临重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日本国内和海外零部件供应商均有停产、减产的风险，再加上运输线路减少、集装箱不足或运输迟滞等物流因素，导致半导体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采购变得困难，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则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动荡。零部件和原材料供给短缺的问题不仅使企业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导致产量下降，还增加企业中间投入品的购买成本和物流成本，压缩企业利润空间。据日媒报道，由于长期持续的芯片短缺等供应链混乱，大批日本国内企业陆续宣布减产或停工计划，其中一些企业的停工计划延续到6月份。

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物价上涨也给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压力。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各国央行纷纷收紧货币政策。2022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而日本央行则继续维持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日美利率差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大，日元快速贬值，汇率从1美元兑115日元左右一举突破130日元。一般认为，日元贬值可以增加出口和入境游客消费，从而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由于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在过去几十年大幅上升，再加上疫情下商品和人员的流动都受到限制，此轮日元贬值不仅积极效应非常有限，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在日元贬值的影响下，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价格的上涨造成企业采购成本上升，并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各个环节，最终转嫁至消费品价格，挤压居民消费。同时，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紧跟美国，对俄能源出口和相关人员等进行制裁，遭到俄严厉反制。日本能源主要依靠进口，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会体现在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成本中。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货成本增加，企业面临收益恶化的困境，设备投资的动力也会不足。对于产值中能源的中间投入占比较高的行业，如矿业、化学、自来水、废弃物处理、造纸、金属、运输、纺织等，企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成本的上升将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传递，中小企业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将承压更重。

从居民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如果企业收益下降导致就业和收入环境恶化，家庭的购买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价格转嫁，消费品零售价格上升也会增加居民生活负担，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将会造成沉重



压力。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4月份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1%。据日本主要经济类智库测算，由于日元贬值叠加能源价格上涨，日本家庭平均全年将增加6万日元的经济负担。

结构性问题制约增长

日本国内消费不振、贸易逆差以及日元贬值等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深层次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痼疾的现实表现，也是日本经济整体走弱的趋势性反映。

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未能使日本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却积累了巨额债务，少子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国内市场萎缩，社保支出的增加又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这导致日本财政在利率上升面前非常脆弱，利率的上调将带来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的大幅上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掣肘，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无门。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在2021年已经降至0.5%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发达国家中的较低水平且未见起色，企业设备投资动力不足带来资本存量增速减缓，再加上体现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钝化、创新能力增速趋缓以及整体经济潜力的不足。在此背景下，日本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长期止步不前，收入增长的停滞又反过来制约了国内

消费和经济活力的改善。

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企业深入国际分工体系，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敏感，易受汇率和国际能源价格等因素影响。这种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更凸显出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和稳定的区域供应链对其的重要性。但是，岸田政府不仅延续供应链对华部分脱钩的姿态，还进一步推进经济安保法案的实施，其中所谓的“四大支柱”，即强化日本国内供应链构建、确保基础设施安全、推进尖端技术的官民合作研究、特定专利非公开，更是有意配合美国制衡中国。这给日本企业造成非常大的预期压力。在对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感下，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无法顺利开展，资金不能流向回报更高的市场，区域供应链畅通受到阻碍，造成人为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最终将反噬日本经济。

随着今年1月份RCEP生效和区域内各国经济在疫情下逐渐恢复，东亚供应链合作将会进一步深化，区域内经济活动也会更加活跃，这对于日本缓解现实经济困境并改善经济结构是难得的机会。因此，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摆正治国理政的当前要务，尤其是重视对贸易体制的完善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避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摒弃封闭性、排他性的小圈子主义，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健发展，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是接下来日本政府亟需努力的方向。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副研究员）

6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通过视频举办的第九届中俄高级经济论坛上，与会专家指出，作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中俄应着力解决当前双方合作中面临的问题，从多方面将合作提质增效，以更好应对挑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地区冲突、大国博弈等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全球化趋势遭遇逆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指出，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挑战，给中俄合作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世界需要以中俄合作的稳定性来应对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共同维护多边体系，助力全球疫后复苏，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良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伊戈尔·波兹尼亚科夫表示，2021年中俄双边贸易经受住了疫情冲击，依旧保持增长，双边贸易额达到1469亿美元。中俄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取得良好进展，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商，且在2019年年末两国间天然气管道启动运行，向中国输送大量的天然气。

与会专家强调，中俄合作仍然存在部分短板。中国人民大学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宪举指出，中俄相互投资仍较少，中国一些企业投资俄罗斯面临的风险较大。俄罗斯在投资法规方面还存在完善空间。为了进一步发展中俄经贸合作，一要夯实经贸合作的法律基础，二要扩大两国之间的中小企业合作，三要把中俄的经贸合作纳入国际性、地区性的合作框架中，如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等。

当前，中俄发展环境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全球产业链被破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主任徐波岭指出，国际储备体系和国际结算体系被破坏，加上全球物流体系和生产性服务业网络正在分裂和重组，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中俄经贸合作的外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在新的背景下，中俄合作需要解决一些迫切问题。一是在中俄之间或者金砖国家平台上建立独立的结算体系，为贸易提供高效、安全的结算、支付和资金划转服务；二是中俄之间必须有能够为生产要素配置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公司；三是要提高中俄之间的产业合作水平和技术合作水平；四是在中俄之间要在多边框架内构建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治理体系；五是在联合国、IMF和WTO等国际组织中强调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

不少与会专家认为，中俄两国尤其应加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白雪凌表示，美国滥用金融制裁，使得美元变成“高风险国际结算工具”，推升非美元货币主权风险溢价，这在客观上会加速金融“去全球化”和“去美元化”趋势。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体系公信力被削弱将会促使其他国家积极寻求替代品，应加快全球非SWIFT系统发展，并形成双边或者多边的支付清算格局，推动国际支付结算多元化发展。

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马斯洛夫·阿列克桑多维奇指出，SWIFT系统的无效主要体现在非公平性和政治化上，整个金融系统已经被破坏。中俄不需要等待原有的机制恢复，而是要创建新的机制。王宪举表示，美元在国际货币结算支付体系中的作用在下降，应该抓住机遇进一步扩大本币的作用。对此，俄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主席米哈伊尔·列奥尼多维奇也指出，美元的主导地位在逐渐衰退，创建自己的货币体系是中俄两国近期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高物价扰动韩国经济

本报首尔记者 杨明



高物价正困扰着韩国经济。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预测，韩国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将达到4.2%，较此前的预测值（1.7%）上调147%。按此推算，韩国未来几个月的CPI涨幅都将保持在5%以上。韩国政府正紧急制定相关对策，以应对高物价给韩国经济和居民生活带来的冲击。

据韩国畜牧产品品质评价院5月下旬发布的畜产流通信息统计报告，韩国国产肉类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以韩国人食用最多的猪五花肉为例，每100克的价格为2846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85韩元），

较去年同期上涨12%。相同重量的猪颈肉价格也达到2681韩元，同比涨幅为11.5%。

报告分析认为，俄乌持续性冲突导致的农作物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饲料价格上涨是肉类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不仅是国产肉类，进口肉类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其中进口牛肋排的价格达到每100克4456韩元，同比涨幅高达80%。

与此同时，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用油和面粉价格急升更加重了人们对物价的不安心理。据韩国央行近期发布的4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食用精制油的价格涨

幅达到11.8%。引发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印度尼西亚对棕榈油出口的限制。尽管印尼在5月23日宣布恢复棕榈油出口，但市场的恐慌心理并未就此消除。而世界第二大小麦种植国印度发布的面粉出口限制令，则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忧虑。

食材价格的上涨正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对通货膨胀担忧的刺激下，韩国老百姓开始大举囤货，这又导致了市场的供货紧张，引发价格进一步上涨。受此影响，韩国餐厅菜品价格出现新一轮提价。

根据韩国消费者院的最新统计，有韩国“物价晴雨表”之称的炸酱面，4月份的单碗平均价格已超过6000韩元，涨幅达14.1%；冷面平均价格也超过了1万韩元，涨幅为9.5%。

食品企业在经历了去年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后已普遍进行过一轮提价。但今年物价的大幅上涨使得食品企业的一季度业绩均不尽如人意。如果企业通过减少市场推广费用、原材料供应网多元化等办法，仍无法消除原材料价格上涨冲击，上调产品价格将是无奈的选择。

为尽快稳定物价，韩国政府正紧急谋划应对方案。最近发表的追加更正预算案就加入了将以1.8%的利率支援每个农户5000万韩元特别饲料购买资金的内容，总额达到1.15万亿韩元；此外还包括追加支援390亿韩元的鸡蛋、肉类、蔬菜等农畜产品优惠券等内容。

在追加更正预算案中，韩国政府还将以国内面粉生产企业为对象，以尽可能降低产品价格涨幅为条件，国库将临时负担企业原材料价格上涨的70%。这意味着，与去年12月份相比，价格上涨部分的70%由政府承担，20%由企业承担，10%由消费者承担。

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韩元大幅贬值、进口物价暴涨等外部因素助推了韩国物价上涨，韩国政府将配额关税作为应对高物价的对策之一。为稳定因供给引发的食用油价格暴涨，政府正考虑对瓜籽油和棕榈油实施配额关税，零关税方案也在考虑之列。韩国目前对瓜籽油和棕榈油的现行关税分别为5%和8%。

针对个人，韩国政府在5月30日发布了3.1万亿韩元规模的“民生安定对策”，预计该政策将减缓物价同比增幅0.1个百分点。通过对策中的各项税收优惠，政府对个人的减税规模将达到6000亿韩元。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镛也呼吁韩国民众共同参与政府抑制物价的行动，携手克服目前的困难局面。